

罗兰·巴尔特在“人生的中途”

黄晞耘

内容提要 1976年罗兰·巴尔特当选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席教授，达到了学术声望的顶点。然而次年10月母亲的去世（也即巴尔特本人所称的“人生的中途”）彻底改变了他的学术生涯乃至人生轨迹。他破天荒地将个人的生活融入到生前的最后两门课程之中，丧母之痛，自己因此而经历的绝望、挣扎、自我拯救的尝试，与课程内容完全交织在一起，这在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中，也许是空前绝后的唯一一个人。这位文学批评家和随笔作家，这位终其一生都对文学怀有深沉热爱和信仰的思想家，将自己获得拯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文学之上。在透彻领悟了生与死的罗兰·巴尔特心中，究竟什么才是他心目中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究竟什么才是文学的最高价值？以及最终，什么才是支撑生命的真正意义？关于这一切的思考，巴尔特用他生前最后两年半的时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为我们留下了一位具有非凡禀赋个性的思想家、批评家和作家，从人生的最悲苦处、最真实处所洞悉的真相。

一 母亲之死

1977年10月25日，罗兰·巴尔特的母亲告别了人世，享年84岁^①。巴尔特本人时年62岁，正值事业和名望的顶峰^②，然而，母亲的离世彻底改变了他的学术生涯、精神世界乃至人生轨迹，他突然间陷入了长达8个月的沉默，除了私人日记以外，没有留下任何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这对于一个以写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人而言，显得尤其异乎寻常^③。此后的28个月里，巴尔特先后撰写了8篇不同类型、不同篇幅的文稿，然而这种写作状态并没有维持太久，在母亲去世两年零四个月后，年近65岁的巴尔特本人也撒手人寰，追随母亲而去。1980年2月25日，巴尔特在走出法兰西学院时，被学院街上一辆小型卡车撞伤，随即被送进萨勒佩特里耶医院（l'hôpital de la Pitié-Salpêtrière）抢救，一个月后，不治而亡。

许多熟悉巴尔特的亲朋好友私下都认为，导

致他最终死亡的并不是那起车祸，因为车祸后他曾在医院接受治疗长达一个月，虽然由伤势引发的肺部感染较为严重^④，但并未达到不可救治的程度。导致巴尔特之死的真正原因，是他自母亲去世后，始终沉浸在难以自拔的哀伤和痛苦之中，母亲一直是他精神上的依托，失去母亲，对于他而言就意味着失去了这种依托，他的内心世界瞬间坠入虚无，留在世间的意义从此不复存在，正是这种绝望的心情致使他丧失了继续活下去的意愿，在很大程度上，他是自愿放弃了生命。

在自传性很强的小说《武士们》（*Les Samouraïs*, 1990）中，于莉亚·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回忆了她和索莱尔斯去医院探望巴尔特时他的精神状态。小说中巴尔特的名字被改为阿尔芒·布雷阿尔（Armand Bréhal），克里斯特娃提到了两个细节：第一是医院的主治医生向他们抱怨巴尔特不愿配合医生的治疗，“根本不与伤病作斗争”；其次，当奥尔加（克里斯特娃）俯身在阿尔芒耳旁，轻声告诉他朋友们都期待着他的康复，鼓励

他坚持接受治疗时,“那具身体(……)不再作出回答。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疲惫和服用药物后的病态,一脸的厌倦。他朝她作了一个放弃和诀别的手势,仿佛是说:‘不用再找寻我了,有什么用……,生活真令人厌烦。’”奥尔加悲伤地意识到:“当放弃生命的愿望被如此平静地表达出来时,没有什么比它更有说服力了。”借小说中人物的对话,克里斯特娃道出了巴尔特那种精神状态的根本原因:“那次丧事(按:指巴尔特母亲之死)已经要了他的命。”^⑤

和克里斯特娃一样,巴尔特的学生及忘年交埃里克·马尔蒂(Eric Marty,后来成为《罗兰·巴尔特全集》主编)在探望住院的巴尔特时,也注意到他处在一种漠然接受死亡的精神状态。后来马尔蒂在《罗兰·巴尔特,写作的职业》(2006)一书中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医生们都说他的伤势并不危险,然而从他的眼神中我却看到了一种巨大的绝望,仿佛已经成为了死亡的囚徒。”^⑥《罗兰·巴尔特的最后日子》(2006)一书的作者埃尔维·阿尔加隆多(Hervé Algalarrondo)则直接将巴尔特在母亲去世后万念俱灰、不愿再争取康复的那种心理称作“求死的愿望”(le désir de mort)^⑦。事实上,巴尔特本人在去世前8个月左右撰写的《明室》一书(也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已经印证了克里斯特娃等人的猜测和分析,他在书中已经明确表达出,母亲死后他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意愿:“强有力的她曾经是我内心的律令,最终成为了我眼里的女儿。(……)如今她去世了,我再没有任何理由跟随人类生命的步伐,(……)我只能等待自己彻底的、没有辩证可言的死亡。”^⑧

二 母与子

要了解母亲去世后巴尔特为何会陷入极度的哀伤和绝望,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他们母子的身世,以及母亲对于他意味着什么。罗兰·巴尔特的母亲昂莉埃特娘家姓氏为班热(Binger),于1912年嫁给海军上尉路易·巴尔特,她在生下罗兰不到一年之际,丈夫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次对德海战中阵亡,23岁的昂莉埃特旋即成为了寡妇,而未满周岁的罗兰则成了丧父的孤儿。1924年,

这位单身母亲带着9岁的罗兰,从西南部丈夫的家乡巴约纳(Bayonne)来到巴黎^⑨,在一家印刷厂里靠装订书籍艰难谋生。

在此期间,昂莉埃特与家住巴约纳附近的一位陶瓷艺术家安德烈·萨尔泽多保持着恋爱关系,并于1927年生下了第二个儿子米歇尔·萨尔泽多(Michel Salzedo),然而几年之后她便与安德烈分手了,独自在巴黎抚养年龄相差12岁的两个儿子。这位母亲不仅具有文化知识,而且性格独立、聪慧而又优雅,对儿子罗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许多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这对母子无论是性格气质还是思维和说话风格都非常相似,简直就像是同一个人。埃里克·马尔蒂回忆起他对巴尔特母亲的印象:“巴尔特的母亲说话时带着巴尔特的风格。(……)某些词汇、某些音调变化、某种语气、某种‘巴尔特式’的思维方式,存在于她所说的一切话中,仿佛归根到底,她就是巴尔特汲取写作营养的真正母语。”^⑩在马尔蒂眼中,“说到底,母亲和巴尔特就是同一个人。(……)一位与众不同、充满独特想法、非常聪明、非常不拘一格的女性”^⑪。事实上,我们在巴尔特后来撰写的那些独树一帜的文字中,总能隐隐约约看到这位不同凡响的母亲的影响。

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解释这种相似性何以如此深刻:自父亲去世后,巴尔特与母亲共同生活了61年。阿尔加隆多曾经统计过,除了青年时期因患肺结核住进疗养院的那段日子,巴尔特“始终不渝地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在国外居住的时候,无论是二战结束后在罗马尼亚,还是1970年代初在摩洛哥,他也总是偕母亲同行,绝不会和她分离”^⑫。相比之下,1927年出生的异父兄弟米歇尔是12年后才加入这个家庭的,而且米歇尔于1973年结婚,此后便与妻子拉谢尔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虽然他们和母亲及兄长都住在塞尔旺多尼街(rue Servandoni)11号一幢公寓楼的五层^⑬。61年漫长的共同生活,导致了巴尔特对母亲极为强烈的依恋与挚爱,然而这种情感并不能简单地用所谓恋母情结来加以解释,这种简单化的解释显然过于狭隘,远不足以涵盖半个多世纪里巴尔特母子相依为命的真实生活状态^⑭。

其实,关于母子情深与丧母之痛,古今中外都不乏例证。为人熟知的高僧弘一法师,其出家

原因便与母亲的去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李叔同为津门一巨富之家的庶出，生母王氏“略通文字，笃信佛教”，李叔同5岁丧父，19岁时偕母亲妻子南迁上海，住在好友家的城南草堂。据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最亲近的学生之一丰子恺在《法味》一文中回忆，老师于“二十岁时陪了母亲南迁上海，住在（……）城南草堂，肄业于南洋公学，读书奉母。他母亲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就死在这屋里。他自己说：‘从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⑮

“他讲起他母亲死的情形，似乎现在（按：丰子恺的《法味》一文写于1926年）还有余哀，他说：‘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只四十（…）岁！’”^⑯丧母后的李叔同“像游丝飞絮，飘荡无根”，先东渡日本学习西洋画、钢琴、话剧，回国后辗转天津、直隶、上海、杭州、南京任教，为现代中国音乐、美术教育的先驱，黄炎培在《考察教育日记》中对他曾有高度评价。

然而，就在艺术创作和教育上成绩斐然之际，李叔同却于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当年二月初九日他在致学生刘质平的信中说：“不佞近耽空寂，厌弃人事。”^⑰熟悉老师身世和内心世界的丰子恺（1918年6月李叔同出家，就是由丰子恺和校役闻玉陪送到虎跑寺的）认为，尽管李叔同在艺术和教育上成绩斐然，“社会对他的待遇，一般地看来也算不得薄，但在他自己，想必另有一种深的苦痛，所以说‘母亲死后到出家是不断的忧患与悲哀’，而在城南草堂读书奉母的‘最幸福的’五六年，就成了他的永远的思慕”^⑱。

李叔同正式出家是在1918年6月31日^⑲，丰子恺的回忆文章《法味》写于1926年8月，是距李叔同出家时间最为接近的回忆文章，加之他与李叔同深厚的师生之情，文中回忆的细节应较为可信。早慧的李叔同作为大户人家的庶出，自小就懂得母亲生活的辛酸与悲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和母亲也是相依为命，所谓“看破红尘”，从根本上说，在弘一法师那里乃是因为母亲辞世之后，便有了像游丝飞絮、飘荡无根的身世飘零感，对于尘世他不仅已经无所依恋，甚至于

“厌弃人事”。然而，如果慈母仍然在世可以侍奉，我们很难设想李叔同会毅然出家，斩断对人间的一切牵挂。只有体悟过人生最深切的悲苦与虚无的艺术家，才可能写下“人生如梦尔，哀乐到心头”；“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那样凄婉动人的诗与歌词。

在法国的文化名人中，我们还可以举出普鲁斯特的例子。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期间曾专门撰写了两篇文章，研究普鲁斯特母亲的去世与他下决心创作《追忆似水年华》之间的密切关联^⑳。这位大作家和巴尔特一样，因为同性恋终生未婚，从未有过属于自己的家庭，母亲对于他不仅意味着母爱、家庭的温暖，而且意味着至关重要的精神依托，也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1905年母亲去世后不久，普鲁斯特在一封信中悲伤地告诉好友罗贝尔·德·孟德斯吉乌伯爵（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我的生命从此失去了它唯一的目的，唯一的柔情，唯一的挚爱，唯一的安慰。”^㉑从1871年出生到1905年母亲去世，34年的岁月里普鲁斯特几乎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的去世同样令他陷入难以自拔的悲伤之中^㉒，并最终成为他几年后全身心投入《追忆似水年华》创作的决定性原因。

与普鲁斯特相比，巴尔特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更是长达61年，这漫长的岁月足以使他和母亲完全融为一体，用母子连心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在埃里克·马尔蒂眼中，“说到底，母亲，就是巴尔特”^㉓，因此他才会痛感母亲之死就如同他自己死了一般。

巴尔特与母亲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是在西南部家乡附近于尔特村（Urt）的乡下别墅。埃里克·马尔蒂亲眼见证了61岁的巴尔特与老母亲“如同一个人”的关系：“如果说巴尔特是（于尔特村）那座房屋中的头脑的话，那么他的母亲（……）则是那座房屋中的灵魂。当身体感觉好一些的时候，她有时会在巴尔特的搀扶下走下楼来。我无法不让自己想到《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的外祖母。”^㉔阿尔加隆多则讲述了那个夏天巴尔特母子间一则真实的故事：“罗兰。认识他母亲的人都说，她总是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在她生前的最后那个夏天就曾有过这么一幕，那是在巴约纳附近的于尔特村，他们的乡下住宅。由于心脏越来越衰弱，两腿日益沉重，她把自己关在二楼的

卧室里,几乎已经不再出门。为了接待从邻近的热尔过来的一对孪生兄弟,她下楼来到了客厅。下午快结束的时候,大师将客人领到花园。母亲的声音此时便响了起来,“罗兰,把你的围巾围上,天凉。”儿子没有任何的不快,恰好相反。“好的,妈妈,我马上就围。”^⑤此时的罗兰·巴尔特已经年过花甲,但在84岁老母亲的眼里,他永远是需要关心的孩子;而在巴尔特的心理上,自己在母亲身边也永远是一个孩子。

1976年的罗兰·巴尔特,凭借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著作,已经成为法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名人,他之所以愿意离开工作多年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离开那个让他感觉非常惬意的工作环境,到法兰西学院担任文学符号学教授,部分原因就是他希望送给年迈且久病不愈的母亲一份礼物,尽一份孝心,让母亲为他这个儿子感到骄傲^⑥。据当时出席巴尔特就职演讲的人回忆,1977年1月7日的那一天对于巴黎整个知识界和文化界都是一件盛事,而巴尔特本人所特别关心的,却是在讲台附近专门给自己的家人预留座位,并亲手搀扶着年迈且生病的老母亲慢慢走到座位前坐下。如果套用中国儒家的说法,我们完全可以说,巴尔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孝子,而他的这份孝心很及时,因为就在他发表就职演讲后9个月,母亲便离开了人世^⑦。

母亲去世的当天,巴尔特给忘年交埃里克·马尔蒂打电话,希望他到于尔特村一起守灵。马尔蒂回忆说:“走进那间停放着她遗体的屋子后,由于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便跪了下来,就像做祈祷时一样,这似乎并没有让他觉得惊讶。随后我们进到他的房间。他开始哭了起来。”^⑧母亲去世一年半后,巴尔特始终无法从丧母之痛中解脱出来;他在《明室》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据说,失去亲人的过程会逐步慢慢地抹去痛楚,我此前、现在都不能相信这种说法,因为对于我而言,时间消除的只是失去亲人时的激动情绪(我没有哭泣),仅此而已。至于其他则丝毫没有改变,因为我失去的不是一个人(母亲)的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品质(一颗心灵):它不是必不可少,而是无可替代。”^⑨

当我们知道了巴尔特是在怎样一种可怕的、近乎绝望的心情下写出《明室》这本书,就能在

貌似平静的字里行间,读出那隐藏着的巨大的情感张力,那每一句貌似平静的话语,都是一个处在理智边缘的人强行抑制着即将爆发的情感火山在喃喃诉说,每句话都是一声痛苦的哀鸣,一声绝望的呐喊,所谓痛定思痛,所谓刻骨铭心,应该就是巴尔特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半个多世纪里,母子连心,如同一个人,母亲死了,巴尔特觉得自己的生命也随之而去。事实上,仅仅两年零四个月后,他真的追随母亲而去,与母亲长眠在于尔特村墓地的同一处墓穴中。

三 “人生的中途”与最后两门课程

母亲之死彻底改变了巴尔特的精神世界和学术思想。在1976年的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中,巴尔特关注的主要还是“无处不在的权力”和语言、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之后的第一门课程《如何共同生活》侧重于伦理学,第二门课程《中性》主要探讨西方的认识论范式。然而,就在第二门课程(1978年2月18日—6月3日)结束四个多月后,他的母亲撒手人寰,如前所述,此后的巴尔特陷入了长达8个月的沉默期。在这段时间里,他究竟在思考什么?他的思想、他的内心世界究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由于没有直接的资料,对此我们当然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第二年夏天,他照例来到南方的于尔特村别墅,开始构思和撰写来年初要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一门新课程^⑩。自从1961年他母亲在这里买下一处乡间别墅后,每年他都陪伴母亲在这里度过暑期,然而这一次,他却是孤身一人了。

新课程的题目叫《长篇小说的准备(一):从生活到作品》,这是八个月的沉默期后,巴尔特写下的第一篇文章。由于撰写于特殊时期,这份讲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新课程的副标题是“从生活到作品”,读者很自然地会猜测,巴尔特这里所说的“生活”是否具体有所指?“作品”是否也具体有所指?如果通观《长篇小说的准备(一)》和第二年撰写的讲稿《准备(二)》,我们不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首先,巴尔特所说的作品并非泛指,因为他在这两门课程中,都明确谈到了对撰写一部“为自己所爱的人作证”的长篇小说的憧憬,就像普鲁斯特通过《追忆似水年

华》所做过的那样；其次，巴尔特留下的数页《新生》构思手稿表明，他所说的生活也并非泛指，他在自己所憧憬的那部长篇小说里希望叙述出来的核心内容，应该是他与母亲几十年相依为命的生活经历，包括母亲离他而去这一残酷的事实，以及他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挚爱 and 无尽的哀思。

巴尔特去世 23 年后，《长篇小说的准备（一）：从生活到作品》这份讲稿于 2003 年由瑟伊出版社和法国“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IMEC）联合出版。仔细阅读这部讲稿，并将其与巴尔特在母亲去世后撰写的另外 7 篇文字加以对比，我们不仅能了解到他在人生最后两年零四个月里的精神状态和心路历程，而且还会进一步发现，这个时期他的文学观、审美观、价值观乃至生命观，都发生了彻底的、根本性的改变。

讲稿一开始就提到“人生的中途”（Le «milieu» de la vie）^⑧，这个说法取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一行诗：“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片黑暗的森林中。”^⑨但丁的恋人贝雅特里齐死于 1290 年，五年后，但丁将赞美贝雅特里齐的诗歌汇编成一本诗集，题为《新生》（*La Vita Nuova*）。在这部诗集的结尾处，但丁提到要为他的心上人竖立一座从未有人为一个女子竖立过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就是他后半生写成的不朽诗篇《神曲》。而他在“地狱”开篇写下“人生的中途”这句诗时，年届 35 岁，以 70 岁为一生，正好处在“人生的中途”。

巴尔特说自己早已过了人生一半的实际年龄（他时年 63 岁），但是却“明确地感到”自己像但丁一样，也到达了“人生中途”^⑩。为什么会突然产生这种到达“人生中途”之感？巴尔特提到了三个原因。第一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来日无多”，到了应该考虑如何度过余生的转折点；第二是不愿意再重复做那些已经做过的事情，希望从此以后能做点新的事情。这两个原因固然是巴尔特的真实想法，但都仅仅是次要的、表面的。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原因，乃是他含蓄提到的第三个因素：母亲之死。之所以说是含蓄提到，是因为巴尔特说出这个原因时毕竟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堂上，面对的是许多慕名而来、但对于他而言却是完全陌生的听众^⑪，除了少数真正了解他的朋友而外，大多数听众并不可能真正懂得母亲之死

对于巴尔特意味着什么，而他也不可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强烈悲伤完全公开。然而，正是母亲之死这个重大变故，才是让巴尔特产生突然到达“人生中途”之感的真正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一事件仿佛是一个分水岭，将他的人生截然分为“此前”（avant）和“此后”（après）^⑫。写下这句话的巴尔特没有预料到，这个“人生的中途”的“此前”是 62 年，“此后”只有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

四 “长篇小说”：为所爱之人作证

母亲去世半年后，巴尔特出差来到摩洛哥。1978 年 4 月 15 日，他在卡萨布兰卡突然间产生了“顿悟”^⑬，在后来构思小说《新生》时，他多次提到了这次顿悟。“顿悟”带来的结果是，巴尔特决定从此“皈依文学”（la conversion littéraire）。为什么是“皈依文学”？我们都知道，巴尔特的学术生涯是从文学批评开始的，1944 年他发表的早期文章之一《关于〈局外人〉风格的思考》，就是对阿尔贝·加缪刚出版的那部成名作的文体研究。此后巴尔特先后出版了《写作的零度》（1953）、《批评文集》（1964）、《批评与真理》（1966）、《叙事作品的结构分析导论》（1966）、《S/Z》（1970）等等一系列著述，成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叙事学、文学符号学的开创者之一。

然而，母亲去世之后的巴尔特在《长篇小说的准备（一）》中明确告诉我们，他所说的“皈依文学”不再是文学研究，而是指文学创作：一种“新的写作实践”（une nouvelle pratique d'écriture）。为什么巴尔特要强调是一种“新的写作实践”？这里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他此前 25 年的著述类型，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术性较强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研究著作，例如《符号学要素》（1964）、《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5）、《时装体系》（1967）；另一类是为他赢得更大声誉、从内容到形式都别具一格因而“难以归类”的著述，其中包括《神话集》（1957）、《S/Z》（1970）、《符号帝国》（1970）、《文本的愉悦》（1973）、《罗兰·巴尔特自述》（1975）、《恋人絮语》（1977），等等。这类著述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既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学术写作，也不是通常

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将关于语言、符号、意义的学术研究,以及关于政治、意识形态、精神分析学的思考融为一体,转化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有意味的形式”,即巴尔特非常看重和推崇的“片段式的写作”(écriture fragmentaire),直到母亲去世之前,这种片段写作已经成为巴尔特独特的风格标志。

然而在《长篇小说的准备(一):从生活到作品》中,巴尔特所提到的“新的写作实践”将与此前的两类写作迥然不同。现在他所向往的,是创作出一部表达爱的作品,他将构想中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定义为一种“爱的行为”(acte d'amour):“这里所说的不是情爱,而是博爱(amour-Agape)(……)。情爱=谈论恋爱中的自我=抒情性;而博爱则是:谈论我们所爱的他人(长篇小说的性质)。(……)爱+写作=承认我们所爱之人的正当权利,也就是(在宗教意义上)为他们作证,也就是让他们得以永生。”^⑧就内容而言,这部构想中的“长篇小说”不会是纯粹的虚构,而是会具有较强的自传性,在此意义上大致类似于《罗兰·巴尔特自述》,甚至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就形式而言,巴尔特所构想的这部作品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不会有某个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延续他的“片段式写作”风格:既不是纯粹的叙事,也不是单纯的随笔或思辨,而是以片段写作的方式,将各种文类融为一体,包括日记、对各种偶发事件的记载、读书笔记、各种思绪,但是行文会从纯粹的片段式转为比较连贯,会有更多的人物描写和更多的叙事成分。最重要的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将毫无疑问是对母亲的追忆,因为巴尔特在《准备》中已经多次明确提到,他希望能够讲述自己所爱之人曾经的存在,就像但丁曾经做过的一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对但丁关于“人生中途”的那句诗产生强烈共鸣:但丁在他人生的中途开始了《神曲》的创作,为自己所爱的人“竖立一座纪念碑”,这个先例让巴尔特产生了为自己挚爱的母亲也创作一部纪念碑式作品的愿望。

不过,与但丁相比,巴尔特和普鲁斯特之间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失去的都是母亲,他们都是同性恋,都终生未婚,没有自己的家庭,

母亲对于他们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最美好、最值得依恋的东西,失去母亲,对于他们而言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普鲁斯特在母亲去世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写出一部“唯一的书”,献给自己的母亲,那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经过一段艰难的犹豫彷徨,普鲁斯特终于在1913年9月开始了构思已久的《追忆似水年华》的创作。这部内容极为丰富的伟大作品虽然涵盖了从1870年普法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上流社会历史,但是其创作最核心的动机,乃是母亲去世之后那份刻骨铭心的怀念。在普鲁斯特心目中,母亲代表着他曾经有过的天堂,母亲的去世,意味着天堂的一去不复返^⑨。下决心创作《追忆似水年华》,对于普鲁斯特来说就是希望借助艺术的手段(长篇小说),找回那失去的天堂。在这部小说中,普鲁斯特将母亲化身为叙述者的母亲和外祖母两个人物,让她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美德。虽然母亲和外祖母在这部小说中并不占据最中心的位置,但是她们却代表着叙述者心中那“失去了的天堂”,没有了她们,就不可能有《追忆似水年华》。通过这两个人物,现实生活中普鲁斯特母亲的美丽、贤淑、聪慧、慈爱,成了永恒的艺术形象,永远留在了读者的心中。

普鲁斯特的创作让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长篇小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理解:“对于普鲁斯特来说:写作的用处在于拯救,在于战胜死亡:不是他本人的死亡,而是我们所爱之人的死亡。通过写作证明他们的存在,使他们永恒不朽,矗立于遗忘之外。”^⑩非常熟悉和喜爱普鲁斯特的罗兰·巴尔特,内心深处何尝不希望也像普鲁斯特一样,为自己所挚爱的母亲,创作出一部寄托哀思、为她“曾经的存在”作证的长篇小说?至此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第三和第四门课程,为什么都是关于“长篇小说”的准备。毫不夸张地说,为亡母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成了罗兰·巴尔特生命的最后28个月里,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唯一目的。

于是我们发现,从《长篇小说的准备(一)》开始,巴尔特内心的关注点已经彻底改变了,不再是此前他非常重视的权力和语言的关系问题,不再是个人自由与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不再是认识论的思维范式问题,不再是意识形态问题。

概言之，知识、思想史、意识形态，这一切都不再是他所关心的对象，他开始将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关于内心深处那部长篇小说的思考、研究与尝试之中，并着手以各种形式，为创作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进行实际的构思和准备。

五 文学与爱的表达

1978年10月19日，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研讨课上发表演讲，题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睡下了》，这个题目取自《追忆似水年华》开篇的第一句话，而巴尔特演讲的内容，就是专门探讨普鲁斯特是如何赋予了《追忆》一种“深情的或者恋爱般的力量”，在这部小说中“讲述自己所爱的人”，让“感人的事物能够被陈述”出来^⑥。1979年1月，巴尔特又在《文学新闻》上发表《启动了》（*Ça prend*）^⑦一文，进一步研究普鲁斯特的创作为什么在1909年8月曾经有过一个月的“沉默期”，而从9月份开始，他便全力投入到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创作之中，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直至1923年最终完成这部长达7卷、三百多万字的巨著。

几乎在研究普鲁斯特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巴尔特于1979年4月15日—6月3日间，还写下了表面上看是探讨摄影的《明室》一书，然而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或者说主要部分，实际就是一种追悼母亲的写作尝试。看过这本书的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告诉巴尔特：“在读到您书中关于母亲的第二部分时，我深受感动。”巴尔特回答说：“您很清楚，我就是为了那一部分才写那本书的，其余的文字都只是一个借口。”^⑧稍后不久（1979年8月21日起），巴尔特又开始了长篇小说《新生》（*Vita Nova*）的创作构思^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了整个夏天直至1979年的12月^⑩，与他撰写第四门课程的讲稿《长篇小说的准备（二）：作为愿望的作品》（1979年夏天至1979年11月）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而这第四门课程的核心内容，更是完全用于探讨长篇小说如何能够成为“爱的作品”（*Œuvre d'Amour*）^⑪。

前面我们说过，母亲之死（也即“人生的中途”）彻底改变了罗兰·巴尔特对学术问题的关注，那些曾让他长期萦绕于心，并促使他写作出

许多名著的语言学、符号学、后结构主义、伦理学、意识形态问题，在他眼中瞬间变得非常次要，甚至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缓解或者抚慰他灵魂深处的创痛，头脑和心灵毕竟是两回事。不过，巴尔特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对文学的思考，恰恰相反，由于母亲的离世让他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目的和意义，这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随笔作家，这位终其一生都对文学怀有深沉热爱和信仰的思想家^⑫，极其自然地将自己获得拯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文学之上。于是，在他生命最后两年半的时间里，巴尔特全身心地投入到他心目中的（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的全新思考上来。之所以说是全新的思考，是因为母亲之死将一切都改变了，包括他此前的文学观、小说观、美学观^⑬。在透彻领悟了生与死的罗兰·巴尔特心中，究竟什么才是长篇小说？究竟什么才是文学的最高价值？究竟什么才是“文学符号学”，这一法兰西学院专门为他设立的教授职位所代表的学科？以及最终，什么才是生命的真正意义？关于这一切的思考，巴尔特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为我们再一次留下了一位具有非凡禀赋个性的思想家、批评家和作家，从人生的最悲苦处、最真实处所洞悉的真相。

作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他破天荒地将个人的生活融入到最后两门课程之中，丧母之痛，自己因此而经历的绝望、挣扎、自我拯救的尝试，与课程所讨论的内容完全交织在一起，这在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中，也许是空前绝后的唯一一个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尔特这一异乎寻常的行为？毕竟，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有不少学者是将与生命体验无关的、纯粹的学术本身视作生命，将知识的探究视作生命的最高意义的，尽管只有极少一部分的人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不少学者并不认为学术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毕竟，在学术之上还有生活本身，而生活的核心，则是生命的意义问题，一个主体性、实践性很强的，而非纯客观的学术性问题。因此，最高意义上的学术应该是与人生融为一体的、以人生为目的的学术。

也许，我们应该像1967年以后的巴尔特一样明确意识到，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人文科学有着

不同于自然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便在于更强调对个体的关注，真正的人文学术，恰恰就在于它自觉地不以自然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的那种客观性作为标榜，有意识地摒弃因拙劣模仿自然科学而自以为具备的那种虚幻的客观性，转而强调人文学术特有的主体性质，尊重和强调主体的介入与表达，并视其为人文学术的真正价值所在^⑨。也许，我们应该将巴尔特这种把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和教学融为一体的行为，视为人文学术领域中一种很高的境界，因为它通向的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关于生命本身的知识及其实践。因此之故，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深切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如果没有将主体投射到研究和思考对象之中，从老庄孔孟到曹雪芹、王国维，从苏格拉底、圣奥古斯丁到但丁和普鲁斯特，如何能够成就他们各自伟大的学问或创作。对于罗兰·巴尔特这样一位终生从事文学研究、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文学的真义，文学的最高价值，难道不正在于将自己切身的人生经历，自己的爱与悲伤、痛苦与绝望，自己关于人生的所思所感所悟投射其中吗？元好问的千古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如果不将这个“情”字仅仅局限为儿女之情，那么人生天地间，在一切学问之上，在一切关切之上，最难割舍、最值得留恋的、最具生命价值的，便是这一个“情”字。李泽厚在古稀之年曾对自己的“情感本体”理论作过如是阐释：“值得珍惜的、真正宝贵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按：指情感）。像名啊、利啊，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没什么意义。真正值得人眷恋的就是这些东西了。那些心啊、性啊（按：此处李泽厚主要是针对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勱将心性论看作是孔孟精髓的观点），都是非常空洞的，有些老实讲是很自私的。所以我讲情本体，人生意义所在的，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

通观巴尔特在母亲去世后留下的所有文字，无论是研究普鲁斯特创作的两篇文章，以讨论摄影为“借口”的《明室》，还是他构思中的小说《新生》，尤其是他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两门课程（《长篇小说的准备（一）、（二）》），以及他生前留在打字机上的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谈论所爱我们总是失败》），其实都是在用不同方式，尝试完成自

己人生最后的、最重要的愿望：“爱 + 写作 = 承认我们所识所爱之人的正当权利，也就是（在宗教意义上）为他们作证，也就是让他们得以永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课程研究》（编号：12BWW042）的阶段性成果]

①罗兰·巴爾特的母亲本名昂莉埃特·班热（Henriette Binger），出生于1893年。

②经米歇尔·福柯推荐，声誉卓著的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大会于1976年3月14日选举罗兰·巴尔特为“文学符号学”讲席教授。

③在埃里克·马尔蒂（Eric Marty）编辑的五卷本《罗兰·巴尔特全集》（瑟伊出版社2002年版）中，从1953年出版《写作的零度》算起，巴尔特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著述发表，其中包括专著、文章、课程概述、各类访谈等等。

④巴尔特不到18岁时（1934年5月）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并接受过胸膜剥离手术治疗，这一疾病的后遗症给他带来了终生的影响。参见：Louis-Jean Calvet, *Roland Barthes*, Ed. Flammarion, Paris, 1990, p. 87.

⑤参见 Julia Kristeva, *Les Samourais*, Ed. Gallimard, Paris, 1990, pp. 404-405.

⑥⑩⑪⑬⑭⑮⑯⑰⑱⑲⑳ Eric Marty, *Roland Barthes, le métier d'écriture*, Ed. du Seuil, Paris, 2006, p. 102, p. 57, p. 62, p. 62, p. 60, p. 64.

㉑ Hervé Algalarrondo,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Ed. Stock, Paris, 2006, p. 252.

㉒ Roland Barthes, *La Chambre clai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Ed. du Seuil, Paris, 2002, tome V, p. 848.

㉓昂莉埃特本人的祖籍在法国东北部的阿尔萨斯。

㉔ Hervé Algalarrondo,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Ed. Stock, Paris, 2006, p. 26. 按：阿尔加隆多的这个粗略统计当然不尽准确，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看，1966—1967年间巴尔特的三次日本之行，1974年与索莱尔斯和克里斯特娃等人的中国之行，母亲并未随同前往。

㉕1976年10月，因为公寓楼里没有电梯，而年迈且患病的母亲已经爬不动楼梯，为了照顾腿脚不便的母亲，巴尔特便和母亲从公寓的五层搬到二层，弟弟米歇尔和妻子则继续住在五层。参见 Louis-Jean Calvet, *Roland Barthes*, Ed. Flammarion, Paris, 1990, p. 258.

㉖熟悉巴尔特母子关系的埃里克·马尔蒂也认为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母子之情，不能将其简单化为俄狄浦斯情结。参见：Eric Marty, *Roland Barthes, le métier d'écriture*, Ed. du Seuil, Paris, 2006, p. 58.

- ⑮⑯⑰丰子恺：《法味》，载《丰子恺散文漫画精选》，丰一吟选编，第11页，第11页，第11—1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 ⑱⑲参见《李叔同年表》，载《李叔同诗文遗墨精选》，李莉娟选编，第458页，第458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
- ⑳参见：Roland Barthes, *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Ed. du Seuil, Paris, 2002, tome V, p. 459. *Ça prend*, tome V. p. 654.
- ㉑Marcel Proust, *Lettre au comte Robert de Montesquiou*, fin septembre - début octobre 1905, in *Marcel Proust Lettres choisies*, Librairie Larousse, Paris, 1973, p. 47.
- ㉒参见 Jean-Yves Tadié, *Proust, le dossier*, Ed. Belfond, Paris, 1983, pp. 292 - 293.
- ㉓④④ Hervé Algalarrondo,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Ed. Stock, Paris, 2006, p. 14. p. 250.
- ㉔参见 Hervé Algalarrondo,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Ed. Stock, Paris, 2006, p. 17.
- ㉕参见 Louis-Jean Calvet, *Roland Barthes*, Ed. Flammarion, Paris, 1990, pp. 259 - 260.
- ㉖Roland Barthes, *La Chambre clai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Ed. du Seuil, Paris, 2002, tome V, p. 850.
- ㉗罗兰·巴尔特是法国南方人，于尔特村离他的出生地贝约纳（Bayonne）约20公里。
- ㉘《长篇小说的准备（一）：从生活到作品》开篇第一节的标题为：人生的中途。
- ㉙Dante,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 中译文参见但丁：《神曲》，王维克译，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 ㉚⑤⑤⑦⑧ Roland Barthes,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I et II*, Ed. Seuil / IMEC, Paris, 2003, p. 26. p. 28. p. 40. p. 34.
- ㉛与普通大学不同，法兰西学院的课程是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这是它自1530年由弗朗索瓦一世创立之初就被赋予的独特之处。
- ㉜此处巴尔特使用的是禅宗顿悟一词的日语译音 Satori，早在《符号帝国》（1970）中，他就使用过该词。
- ㉝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最后一卷《重现的时光》

中写下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Marcel Proust, *Le temps retrouvé*, Ed. Gallimard, 1990, p. 177.

- ㉞ Roland Barthes, *Longtemps, je me suis couché de bonne heure*, in *Œuvres complètes*, Ed. du Seuil, Paris, 2002, tome V, p. 469.

㉟按：Ça prend 一语在字面上可以有多种翻译，而在巴爾特的这篇文章中，该语所要表达的，乃是普鲁斯特的创作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形式困扰（最初普鲁斯特打算用美学对话和散文的形式写作那部“唯一的书”，这一构想的成果便是《驳圣伯夫》，但最终他决定采用第一人称的长篇小说形式，由此写成了《追忆似水年华》）、以及1909年8月的“沉默期”之后，是如何于这一年的9月突然间“启动了”的。

- ㊱《新生》标题使用的是意大利文 Vita Nova，与1295年但丁的诗集《新生》（Vita Nuova）同名。

㊲参见：Nathalie Léger, *Préface*, in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I et II*, Ed. Seuil / IMEC, Paris, 2003, pp. 17 - 18.

㊳参见：Roland Barthes,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I et II*, Ed. Seuil / IMEC, Paris, 2003, pp. 224 - 225.

㊴巴尔特在《长篇小说的准备（二）》临近结尾处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对文学的这种欲望恰恰因为我感到它正在日趋衰弱、正在被废除而有可能更加强烈：在此情况下，我对它的爱刻骨铭心，甚至令人震动，就像我们去爱、去拥抱某种即将死亡的东西一样。”参见：Roland Barthes, *La préparation du roman I et II*, Ed. Seuil / IMEC, Paris, 2003, p. 353.

㊵例如1975年他在访谈录“罗兰·巴爾特的20个关键词”等文章中所提出的“小说性”（le romanesque）概念。参见：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 propos recueillis par Jean-Jacques Brochier, in *Œuvres complètes*, Ed. du Seuil, Paris, 2002, tome IV, p. 866.

㊶参见黄晞耘：《罗兰·巴特思想的转捩点》，《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